

劉君惠 李恕豪●

楊 鋼 華學誠●

揚雄方言研究

巴蜀書社●

- 劉吉忠 李恩家
- 楊 振 牟學誠

揚雄方言研究

- 巴蜀書社
- 一九九二年·成都

(川) 新登字008號

責任編輯：陳大利

封面設計：李文金

揚雄方言研究

劉君慧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

巴蜀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張11.75 插頁 2 字數270千

1992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190冊

ISBN7—80523—477—9/H·14

復膜本定價：7.85元

揚雄《方言》研究

序 論

(一)

早在公元一世紀初，蜀郡成都人揚雄撰寫了《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簡稱《方言》。當時張伯松就驚嘆為“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①公元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當代學者羅常培也贊嘆揚雄《方言》“真是中國語言史上一部‘懸日月不刊’的奇書”。②張伯松與揚雄累世交好。他“不好雄賦頌之文”，③對“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不肯壹觀”，④而獨贊頌《方言》，他對揚雄的學術著作是有鑑別的。羅常培則是從漢語史和漢語言學史的發展歷程來評價《方言》，是科學的論斷。

在語言研究中，最先引人注目的是語言的差異。語言是不斷運動的，認識語言，就是要從時間上和空間上去認識語言的運動形式。語言在時間上的差異往往不是人們所能首先察覺的；在空間上的差異，却是人們首先覺察的而且是最敏感的。“一個區域內各地言語的差異，從來沒有逃脫人們的注意”。⑤所以，世界上一些文化發達的古國的學者們都曾有過關於方言的論述。例

如，古希臘的學者就曾經論述過古代希臘東部的伊奧尼亞方言和阿狄克方言間的語音差異以及希臘各種方言間的差異。^⑥梵語的語法是繁密的，所以古印度的學者常常對梵語方言的語法差異加以論述。從我國古代語言研究的歷程來看，詞彙學創始最早，我國古代學者們觀察方言現象時，也側重在方言詞彙的比較方面。早在周秦時期就有由國家設官每年秋天巡行鄉邑，收集方言藏之秘府的制度。^⑦方言詞彙收集工作最早、規模最大的要算中國了。

經過秦代的戰亂，原來藏諸秘府的方言資料大部分散失了。

“蜀人嚴君平、臨邛林間翁孺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君平財有千言，翁孺梗概之法略有。”^⑧揚雄以這些殘存的方言資料為基礎，利用當時知識分子（孝廉）、兵士（衛卒）們來京城的機會，“常把三寸弱翰，以問其異語”，^⑨用了27年的精力，收集並整理出《方言》這樣一部我國最早的方言比較詞彙集。

歐洲最早的關於方言詞彙的研究出現於18世紀。布龍菲爾德說：“18世紀末，開始出現一些方言詞典，集集了非標準的言語的詞彙特點。”^⑩到了19世紀中葉，俄國科學院才出版了《大俄羅斯方言詞典稿》。兩千年前，揚雄處在漢代經師們整理先秦典籍、辨識異文、考訂音讀、離析章句、建立訓詁學的時代，却能卓然於訓詁章句之學以外，獨樹一幟，除了他胸中爛熟的歷史文獻外，特別從人民口裏的活語言出發，運用客觀調查的方法，寫出了不僅在我國而且在世界上都是最早的一部方言比較詞彙著作。這是我們應該十分珍視的一宗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

(二)

語言的研究反映了語言學家的思維和思想的進展歷程。一個有創造性的語言學家能夠超越他所處時代的研究模式和學術風氣，使語言研究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揚雄正是一位有創造性的語言學家。首先，他是一位擯棄“蓋天說”，堅持“渾天說”的科學家；他也是一位從唯物主義自然觀出發，堅定地反讖緯，反宗教神學的哲學家；他還是一位沉博絕麗的文學家；他還精研樂律，《漢書·藝文志》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有樂四篇，並著有《琴清英》一書。^①他在天文學、樂律學、哲學、文學諸方面的遼密而高深的造詣，他的廣闊的科學文化視野，對他的語言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十分深刻的意義，使他成為一位有創造性的語言學家。

揚雄在他的《法言·問神》裏有：“言，心聲也；書，心畫也。”這樣一個見解。羅常培曾舉“言，心聲也”這句話作為“我國古代非常精彩的語言理論”之一。^②揚雄能夠把語言和語言的書寫形式區別看待，這是一個卓識。“言，心聲也”，這是說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書，心畫也”，這是說“語言的書寫形式不是思想的直接現實”。揚雄斷然指出“書不能達其言”^③，這樣的見解，對於他能夠在西漢經師們的章句訓詁之學以外別樹一幟地研究活的方言，具有深刻的理論導向作用。

揚雄“默而好深湛之思”，他不僅能沉思，而且有思想，他有唯物主義的自然觀，他主張要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去認識事

物。他說：“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故不攬所有，不強所無。譬諸身，增則贅，割則虧。”^⑭他用這種自然觀來觀察語言，他堅定地認為“書不能達其言”，因為書面語言對語言的本來面目已經有所“增”、有所“割”了。口語是書面語的源泉，書面語是在口語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口語是語言的本來面目。這就是揚雄要研究活在人們口裏的方言的湛湛的哲學思考。

漢代經師們章句訓詁工作的對象是歷史文獻所保存的書面語言。可是，歷史文獻不能告訴我們關於語言的一切具體的真實的現象，它失去了口語的豐富多彩的活躍因素。方言的復雜多變，更遠遠不是歷史文獻資料所能窮盡的；相反，活的方言口語為我們提供的却是歷史文獻所不能提供的更為珍貴的材料。揚雄深刻認識到這個“源”，加上他在二十七年中的辛勤的方言調查與研究的實踐，更加堅定了他“不師章句”的信念。^⑮

章句訓詁之學在漢代的興盛，這是當時社會、歷史的需要。六國時已經“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了，秦火以後，典籍蕩然。漢惠帝四年始除“挾書”之律。西漢經師們在灰燼之餘，皓首窮經，各以“家法”傳授，博士弟子則恪守師說，家有律例，絕不相通，“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這也是時勢使然。訓詁學有兩千多年的發展歷史，它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地位是應該充分肯定的。這裏要指出的是西漢時期的章句訓詁。《漢書·藝文志》根據當時經師們的工作對象，把“小學”列為經學的附庸，^⑯這是符合歷史實際的。當時經學領域裏有今古文之別，今文家流別之爭，又勢若水火。董仲舒就慨嘆“《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⑰經學上的門戶之爭，籠蓋着當時的學宮，形成一層濃厚的經學迷霧，當時的學者很難從這樣的迷霧裏

解脫出來。揚雄正是能够從當時的經學迷霧裏解脫出來的一位有創造性的語言學家。我們驚嘆揚雄在學術思考中的驚人的敏銳性。

漢代重閥閱，重貴產，重經術。《漢書·揚雄傳》說：“揚季遷嶠山之陽曰郫（今成都郫縣），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它楊於蜀”。^⑧這個單家孤族談不上閥閱。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談不上貴產。他“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多不解”。^⑨他從不以經術自見。他四十三歲了才自蜀遊京師（本傳說“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戴震考定揚雄以漢成帝元延二年至京師，時年四十三歲。見《方言疏證序》）。“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繁，得肆心意。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室”。^⑩他就這樣“校書天祿閣上，用心於內，不求於外”，^⑪默默地撰述《方言》歷二十七年。以王莽天鳳五年（公元18年）卒，年七十一。他四十三歲到長安，撰寫《方言》二十七年，就逝世了。這樣的獻身精神是十分可貴的。

揚雄生活在西漢王朝行將復滅的前夕，王莽憑藉威勢篡奪了政權，這個殘暴君主肆意誅戮，連他的“國師”劉歆的兒子劉棻也流放四裔了。棻曾從揚雄問奇字，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於時，人皆習之，惟劉歆敬焉”。^⑫王莽時，劉歆爲“上公”，向揚雄求觀《方言》，揚雄說：“未定，未可以見。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⑬這樣矜慎自守的學術個性和氣節，是十分感人的。

揚雄死後，“王邑、嚴尤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耆，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願君與譚不及見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

具存。”^②這個“篇籍具存”的《太玄》都“終不顯”，何況當時尚未寫定的《方言》。

宋代學者善疑，洪邁看見《漢書·揚雄傳》和《漢書·藝文志》都不曾提到《方言》，就大膽懷疑《方言》不是揚雄所作，而是“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③這是很輕率的。《漢書·藝文志》本於劉歆《七略》。劉歆奏其《七略》，在漢成帝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漢書》斷限在王莽之敗，即地皇二年（公元23年），上距《七略》成書，整整30年。這30年中，新發現的圖書不少。《後漢書·儒林傳》說：“光武還還洛陽，其經籍秘書，載之二千餘兩。”其中定有許多劉歆不曾檢校的書籍。《七略》是綜合性的羣書目錄。目的在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而不在于全面反映一代文獻。洪邁思辨未審，輒據以否定揚雄的著作權是不對的。^④

(三)

方言的勾稽整理工作是十分繁難的。

周秦以來藏之石室的方言資料，當時“輶軒使者”采輯以後納入石室時，可能有個分類貯藏的細則，但已散失了，林閭翁孺也只是“梗概之法”略有。那麼，揚雄在調查核實以後的整理、研究，分別部居的工作是很艱巨的。《方言》在依類歸卷這一點上與《爾雅》相似。但《方言》的纂述目的和研究方法則與《爾雅》大不相同。他要精細地分析方言的復雜現象，必須創造性地使用一些精確的專用術語。《方言》全書共有669個條目，搜集

了二千三百多個詞。對這兩千多個紛紜複雜的詞，揚雄分別創製了(1)“通語”，(2)“某地某地之間通語”，(3)“某地語”，(4)“古今語”或“古雅之別語”，(5)“轉語”等等術語，用以區別這些詞的區域差異和古今流變，這是前無古人的創造，這是他在漢語方言學上的開創性工作。

揚雄以人民口裏的活語言為研究對象，而不是以有文字記錄的書面語言為研究對象。所以，他在記錄《方言》時所使用的文字有好些只有標音的作用。他有時沿用古人已造的字；有時用音近的假借字；有時還有揚雄自己造的字；至於“無寫”、“人兮”之類，實際上都只是標音的符號。^②這對於當時那些“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的經師們，是一種勇敢的批判，這也正是揚雄的語言學思想的開創性的體現。

方言研究要從橫切面的描寫入手，再進一步作縱的歷史比較。揚雄在這兩方面的工作都作得很出色。他搜集了豐富的並經過核證的方言資料，對方言本身的語音和詞彙作了系統的描寫；對幾個地區的方言作了相互比較；他還要把這些比較的結果跟較古階段進行比較。一方面，他理清了這些東西南北的通語、異語的互相異同的情況，正是他自己說的“語言或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③他的研究方法是很邃密的。一方面，他對歷史典籍爛熟胸中，他能夠發現方言中的“古今語”和“古雅之別語”，指出一些方言中殘餘的古語或古方言詞。前一種是描寫詞彙學的工作，後一種是歷史詞彙學的工作。

“轉語”，這是揚雄首創的術語，用來指明一個詞在不同地區語音流轉的現象。如：“庸，謂之倮，轉語也。”（卷三）

“燥，火也。楚轉語也。”（卷十）“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謂之嘏，或謂之夏。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奘，或謂之壯。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將，皆古今語也。”（卷一）郭璞注云：“語聲轉也。”揚雄能從方言調查中發現語言在空間或時間上的運動形式，觀察到同一個詞在不同的運動形式中的不同的變體，在當時說來，是創造性的發明。清代戴震的《轉語二十章》，程瑶田的《果臝轉語記》，王念孫的《釋大》，就是揚雄“轉語”說的發展。

從上面所述，可以說《方言》為漢語方言學奠定了基礎，是我國方言研究的古典的優良傳統，是方言地理學的最早的著作。

（四）

語言的地區差異具有非常復雜的因素：語言的時間差異和空間差異是互相交織的；語言的分化作用與整化作用又是互為消長的。因此，方言的地理差異是犬牙交錯的，很難確定一個明確的畛域。

方言是全民語言的變體。不同地域的語言變體之間的界限具有相對性和模糊性。變體的共同特徵與個體特徵之間、各個變體之間，形成了縱橫交錯的聯繫。

因此，要研究一種語言的不同形式在空間上的分佈情況是一項十分繁難和艱巨的工作，而這正是方言地理學的目的和任務。兩千年前，揚雄勇毅地肩負了這一任務。他對大量的“交錯相反”的方言現象，“詳悉集之，方復論思”，作了艱苦的歸納整

理、分別部居的工作。這是難能而可貴的開創性的工作。從方言地理學的目的和方法兩方面來衡量，《方言》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為方言地理學的最早的著作，是開創性的著作。歐洲的方言地理學發源於德國。德國語言學家 G·溫克爾（1852—1911）在 1881 年繪製的方言地圖，直到今天，這個調查、繪製的方言地圖仍沒有出齊。比起揚雄《方言》來，G·溫克爾的工作晚了將近一千九百年。

揚雄在語言研究工作中，提出了明確的原則。他說：“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②他對什麼問題都主張“有驗”，他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反對“章句之徒，坐而守之”（《漢書·揚雄傳》）的書本營撓。這種精神支持着他二十七年的方言調查、研究工作。

方言地理學是方言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揚雄“筆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功績是要充分肯定的，他的研究方法更是我們應該繼承並加以發揚的。本研究把《方言》與方言地理學作為重點內容，在第二編中作了遼密的考索和翔實的闡述。

依據《方言》一書所提供的材料，利用方言地理學的方法來劃分漢代方言區的工作，始於林語堂，他分漢代方言區為十四個。羅常培、周祖謨把西漢的方言分為七個大區。美國語言學家司禮儀（Paul L—M Serruys）分為六個大區。我們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以《方言》的材料為主，參考其他文獻，聯繫當時各地區的人文歷史如政治、經濟、文化、商業、交通和移民等情況，劃分出了十二個方言區，在每一個方言區下面還列出了次方言區。這樣的劃分，基本上反映了西漢時代漢語方言分布的實際

情況。我們在每個方言區以及每個次方言區下面都聯繫人文歷史的演進情況作了切實的考索和闡述。

(五)

揚雄嘆息說：“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⑩《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在西漢時期的經學迷霧中，在神學目的論和讖緯迷信的浪潮中，揚雄對他自己耗了二十七年的精力，默默地“注續”的《方言》，發出了“知我者希”的慨嘆。然而他却以“知希”自“貴”。他說：“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⑪他把希望寄托於後世的知音者。

《方言》一書的真正知音者，羅常培認為“前有郭璞（276—420），後有王國維（1877—1927）”，“能够了解並應用《方言》本書的條例、系統、觀點、方法的，簡直可以說沒有人。”^⑫這個論斷是很精到的。

關於《方言》以後的中國古代方言學，我們在第一編中有專章作了概述。

關於《方言》本書的刻本流傳及刊定工作，周祖謨作了精覈的評述。他的《方言校箋》，以宋李孟傳本作底本，參照清代戴震、盧文弨、劉台拱、王念孫、錢繹各本，“論其是非，加以刊定”，旁證的論著達三十三種，其中的《原本玉篇殘卷》、《玉燭寶典》、《慧琳一切經音義》、《倭名類聚鈔》、《王仁煦切韻》、《唐韻殘卷》等都是清代學者所沒有見過的。周氏對《方言》原書的譌文脫字都依例訂正，“不愧是‘後出轉精’的‘定

本’。”^③吳曉鈴爲《方言》及郭注編了《通檢》，分析精細，義例嚴密，並富於統計性，爲運用《方言》作研究的人作了津梁。1956年9月，《方言校箋及通檢》出版後，承曉鈴兄寄贈給我，使我獲益匪淺。

從東漢以後，訓詁學已經不再是經學的附庸了。可是，漢代經師們釀成的經學迷霧，還殘留在一些人的腦海裏。南北朝時就還有些“父康成（鄭玄），兄子慎（服虔）”的“北方之學者”。直到清代還有人主張“經師不可廢。”^④齊召南還說：“子云《方言》惟一二附於經者乃解經家必用之。非是類也，可束而不觀，其爲覆瓿一也。”像齊召南這樣不辨章學術，不考鏡源流，一味墨守的經師眼光，也障蔽着一些認識《方言》、評價《方言》、注解《方言》的人的視野。所以羅常培嘆息說：“揚雄以後，懂得這部書是拿語言作對象的，前有郭璞，後有王國維”了。

我們不可能要求注解《方言》的人都要是揚雄的知己。我們也應該看到歷代注釋家對《方言》一書的確有爬梳參訂、考釋疏證之功。戴震說：“宋元以來，六書故訓不講，故鮮能知其精義。”^⑤通曉六書，精研故訓，正是認識《方言》的“精鑿”的鑰匙。通曉古詞、古義，結合方言詞彙的研究，從而闡明詞彙、語義的歷史演變軌迹，這也是揚雄著書的目的之一。

本研究的第三編對歷代《方言》注家舉出郭璞《方言注》、戴震《方言疏證》、盧文弨《重校方言》、劉台拱《方言補校》、王念孫《方言疏證補》、錢繹《方言箋疏》作了評述。章炳麟說：“持論當本之名家，不當本之縱橫。”^⑥我們對各家的得失短長，有所論列，力求綜覈，不作泛論，更不敢快意逞辭。妄下

雌黃。劉勰說：“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① ②我們聞見未洽，識斷未精，繩愆糾謬，敬望讀者。

(六)

漢語、梵語、阿拉伯語、希臘語、拉丁語這五種語言，在傳佈文化上曾經有過極大的貢獻。現在，梵語、希臘語、拉丁語已經失去了傳佈現代信息的意義。而漢語、阿拉伯語還有蓬勃的生命力。在當前，正確認識漢語，深入總結漢語學史的歷史經驗，對於弘揚民族文化，振奮民族精神，具有重大的意義。

漢語方言學對於漢語史的研究，擔負着創造新經驗，建立新理論的任務。建國以來，在全國開展的漢語方言調查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但是，把語言材料和社會、歷史相互印證，更能說明語言現象的本質特點和歷史發展道路。比如，現在膠東方言為什麼在北方話裏自成一個土語羣？我們把它跟揚雄《方言》所紀錄的“東齊”語相比較，使我們合理地看到它們之間的歷史聯繫。齊魯方言和東齊海岱方言的差異，反映了兩者在文化上的距離；它們之間的共同的一面，則可以從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基本上統一的大汶口——龍山文化得到解釋。這樣的工作，目前還作得不够。如何回過頭來，聯繫古代漢語方言現象，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總結漢語方言學的歷史經驗，在這裏還有廣闊的天地。

揚雄《方言》為漢語方言學奠定了基礎，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方言學著作，是我國方言研究的古典的優良傳統。如何繼承並發揚這個優良傳統，用廣闊的科學文化視野，拓寬漢語方言研究

的道路，為文化教育事业服務，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我們編寫這部書的目的。

我只是對揚雄《方言》這部“懸日月不刊的奇書”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全書分三編：第一編討論揚雄這個人和《方言》這部書，以及《方言》在語言學史上的地位。第二編討論《方言》和方言地理學。依據《方言》一書所提供的資料，利用方言地理學的研究方法，並着重聯繫當時各地區的人文、歷史，進行了遼密的考索和翔實的闡述。第三編對歷代《方言》注家作了評述。第一編由楊鋼同志分撰；第二編和第一篇中“《方言》與漢代文化”一節由李恕豪同志分撰；第三編由華學誠同志分撰。

當代學者研究《方言》的著述很多，使我們獲得很多的教益，在每個章節裏都注明了出處。在此，應該向他們致謝。1983年，王士元教授從柏克萊加州大學將美國語言學家司禮儀(Paul L-M Serruys)所著《〈方言〉一書中的漢代方言》一書寄給我。司禮儀是趙元任的學生，是前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學者，柏克萊加州大學東方語言學博士，發表過學術論著已十多種。他是在歐美學人中唯一能全面研究《方言》的人。他的書，在研究方法上給我們很多啓迪。在此，謹向王士元教授致謝。

本書主要蘄向是對《方言》一書作新的探索。探驪未必得珠，瑕疵在所難免，敬乞讀者指正。

劉 君 惠

1990年12月 於四川師範大學

附注：

①揚雄《答劉歆書》。

②羅常培《方言校箋及通檢·序》。

③同①。

④王充《論衡·齊世篇》。

⑤布龍菲爾德《語言論》，1980年商務版第404頁。

⑥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1982年，商務版，第267頁。

⑦揚雄《答劉歆書》，應劭《風俗通義·序》。

⑧、⑨《答劉歆書》。

⑩布龍菲爾德《語言論》，1980年商務版第404頁。

⑪見《玉函山房輯佚書》，有鄭媛館補校本。《太平御覽》，《事類賦》，《藝文類聚》，《太平廣記》，《文選李善注》，《路史後記》都有稱引。

⑫羅常培《中國的語言學》，載《科學通報》1953年第4期。

⑬《法言·問神》。

⑭《太玄·瑩》。

⑮揚雄《答劉歆書》：“雄少不師章句。”

⑯班固采劉歆《七略》作《漢書·藝文志》。劉歆奏其《七略》，在漢成帝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

⑰見《春秋繁露》。

⑱《漢書·揚雄傳》顏師古注：“蜀諸楊姓者皆非雄族，故言雄無它楊。”

⑲揚雄《答劉歆書》。

⑳同上引。

㉑《漢書·揚雄傳》。

㉒同上引。

㉓《答劉歆書》。

㉔《漢書·揚雄傳》。

㉕見《容齋三筆》卷十五。

㉖馬學良《方言考原》一文，解答了關於《方言》作者問題的疑問。